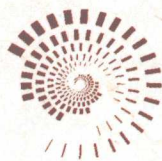


未名·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研究丛书



二十世纪 中国史学史论

王学典 陈峰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二十世纪

中国史学史论

王学典 陈峰 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史论/王学典等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
(未名·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研究丛书)

ISBN 978-7-301-16266-8

I. 二… II. 王… III. 史学史-研究-中国-20 世纪 IV. K09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20210 号

书 名: 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史论

著作责任者: 王学典 陈 峰 编

责任编辑: 李廷华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6266-8/K · 0668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673
出版部 62754962

电子邮箱: minyanyun@163.com

印 刷 者: 北京山润国际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32.5 印张 512 千字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65.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编 选 说 明

20 世纪是中国学术史上极为重要的时期,是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时期,是中学与西学相互激荡产生空前创获的时期。作为中国学术中的“显学”的历史学,发生的变革尤剧。历史学在这 100 年中变化的速率和幅度都是前所未有的,常常是“爆炸”式、“井喷”式的。从世纪初年的“新史学思潮”,到实证主义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直到 90 年代的新国学,可谓此起彼伏、一波三折。即使在同一时段内,也是流派蜂起,呈百舸争流、千帆竞进之势。例如,在三四十年代,“古史辨派”、“唯物史观派”、“食货派”、“禹贡派”、“战国策派”等,诸家并立,争雄交锋,异彩纷呈。

处在新世纪的起点上,对前此 100 年的历史学的发展行程作一番学术史总结无疑是必要的。目前学界已经出现一些侧重于介绍反映各具体领域、具体部门断代或专题的研究实绩的文字,如《历史研究》杂志的“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回顾”和《近代史研究》杂志的“五十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栏目中的文章等,但集中反映、折射 20 世纪史学研究全局的文集尚付诸阙如,总令人有见树木不见森林之憾。为填补这一空白,我们拟编选一部 20 世纪宏观史学评论文集。这些文字或侧重发展过程,或突出问题意识,集中系统地展现百年史学发展的概貌。同时,它们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其中不少是当事人或亲历者的跟踪点评,弥漫着当时的学术气息,是珍贵难得的真实记录。

第一部分的文章分别是关于 20 世纪几个重要时段的,如晚清、民初、民国时期、抗战时期、20 世纪后 50 年、后 20 年的评论。它们体现着各个时段的学术特点,有利于读者进行比较,从中发现学术演进过程中的“变”与“不变”。

第二部分是对 20 世纪史学的总体把握。这些文章将整个 20 世纪中国史学作为考察对象,就其发展大势、学风转换、方法更新等重要面向进行论究。可帮助读者对 20 世纪史学的中心线索、关键性变动和发展轨迹有一个整体认知。

第三部分是关于西学冲击下的 20 世纪中国史学的。20 世纪中国史

学的发展的基本特点是随西潮而动,与西方史学的影响密不可分。西方史学是中国史学变革的外在动力。欧美及日本汉学的观念和方法更是强力诱导着中国史学的进退,其中国史研究为本土学者提供了直接示范。从这些文章中读者可以发现西方史学对中国史学深远广泛的影响,从而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中国史学的发展脉络。

我们的编选原则是,尽量保持中立,不拘于门户之见,不为权威和虚声所惑,尽可能收集代表各种观点的文字,展示各家观察史学的不同立场和视角,以收到“横看成岭侧成峰”之效,避免图景的单一和平面化。多元化是我们的追求,我们决不人为地屏蔽某种观点和声音。不管立场激进还是保守,正统还是异端,只要足以成一家之言者,都酌情收录。当然,任何选择都是在一定的先入之见的支配下进行的,都不免有所偏弊,有所遗漏,这是一种无奈。但我们希望将不可避免的偏见造成的学术误差降至最低值。

此外,这些选文出于众人之手,且形成于不同的时代,不仅风格各异,而且,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学术水准也难免参差不齐,未必篇篇俱是精品佳作。本来,编选者应当尽到甄别良莠之责,替读者把关,但是,为了再现学术界众声喧哗的实态,贯彻“学术乃天下之公器”的理想,我们也不得不收入少量史料价值大于学术价值、能够显示一种倾向却未必是合理倾向的文章。这也是编选者面临的一种困境。不过,让各家各派相逢一处,同台亮相,更便于读者亲自比较品评其深浅高下,从而避免了编选者有意无意的遮蔽,倒也不无裨益。

最后,因文章分属于各个不同时期,为了保持原貌,编辑没有改动(包括文中的注释),特此说明。

目 录

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	齐思和(1)
民国以来的历史学	方 豪(35)
民国后 20 年史学的新趋向	许冠三(51)
抗战以来的历史学	叶蠖生(70)
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国史学倾向	刘茂林 叶桂生(91)
50 年来中国之新史学	周予同(104)
50 年来的中国历史编纂学	〔美〕邓嗣禹(146)
60 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	白寿彝(165)
近 20 年中国历史学的新发展	陈启能(174)
近 50 年的中国历史学	王学典(188)
台湾史学的“变”与“不变”:1949—1999 年	王晴佳(235)
世纪之交中国历史学的回顾与展望	戴 逸(262)
20 世纪的中国历史学	林甘泉(276)
20 世纪的中国史学	瞿林东(302)
20 世纪史学的回顾	赵俪生(329)
百年史学历程回顾二题	王家范(333)
20 世纪中国历史学的三大情结	陈支平(350)
对 20 世纪中国史学的反思	雷 戈(361)
20 世纪的中国史学:对其背景和发展过程的评论	〔美〕J. 格雷(368)
20 世纪中国史学:特点和趋势	于 沛(379)
中国史学的现阶段:反省与展望 ——《史学评论》代发刊词	余英时(390)

当代中国史学的三大主流

- 在“中国留学生历史学会”成立会讲词原稿…… 唐德刚(407)
- 20 世纪西方史学输入中国的行程 …………… 张广智(413)
- 晚清民国时期的国学研究与西学 …………… 桑 兵(454)
- 美国对中国史研究 30 年回顾 …………… 〔美〕霍尔(473)
- 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范式转变与中国史研究的现实处境 …… 杨念群(480)
- 日本近代汉学中的史学研究 …………… 郑春苗(500)

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

齐思和

一、中国史学何以落了伍？

西洋史学赶上并且超过了我们，不过是近百年来事。在一百多年前，西洋史学，无论在质或量方面，皆远不及中国。中国民族是一个很切实的民族，在玄想的学问方面，不但不及西洋，亦且不及印度。但中国人在史学方面久擅胜场，我们的祖先在这方面有光荣的传统，有惊人的成绩。至于何以到了现在，我们的史学反而落后了呢？这不是因为过去百年中中国史家不争气，而实是近百年来西洋史学突飞猛进的结果。

百年以来西洋史学之惊人的进步，不但是由于西洋历史家的努力，而且是整个西洋文化进展的结果。历史是一门综合的学问，是整个人生的反映，不能离开其他学术而独立。近一百多年来，西洋文化发生了空前的变化，改变了整个的人生，一切学术思想皆发生剧烈变化，而史学所受的影响尤为重大。在政治方面，民主运动和几个重要政治革命的结果，人民夺取了君主和贵族的政权，成了国家的主人。民主运动发展的结果改变了历史家对于历史的看法。一向专为帝王作家谱，为贵族作起居注的历史家，感觉到人民在历史上的重要性，而开始提高他们在历史上的地位了。帝王贵族们的政治阴谋和战争是个人的，平民生活的进展是集体的，社会的，平民既代替君主和贵族成为历史的主人翁，传统的政治史，战争史也扩大为文化史社会史了。于是乎历史的主人翁由少数的帝王贵族而扩大为一般群众，由政治战争的描写而改变叙述日常生活。历史的范围扩大了，历史

的基础雄厚了,历史民主化了。在经济方面,工业革命的发生和进展,使西洋由中古式的农村经济社会踏进了近代工商社会。马克思看出生产技术和生产方式的改变对于文化进展的重要性,创唯物史观学说,指出了经济因素的重要性。历史家受到了时代思潮的影响,渐放弃以前专以政治军事为主的历史而以经济的发展为主要的脉络了。在学术思想方面近代自然科学惊人的进展,对于生活伟大的贡献,改变了西洋人的学术思想,研究社会现象各部门的学问也应用自然科学家的方法来研究他们的问题,而称他们的学问为社会科学了。历史家自然也不甘落后,也开始采用科学的客观态度,专门的研究,对于材料细密地审查,而以历史为一种“科学”。科学家中达尔文的进化论,对于历史家的影响很大,以后历史家对于文化的变化,也采取生物的现象,如“演变”,“发展”,“生长”等名词来研究它,认为文化也是生成的,而非静止的,死的。现代史家每研究一种制度都要注意他的起源,发展和衰老,这当然是受了进化论的影响。

最近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不但改变了科学家对于自然现象的解释,此时历史家也提倡历史相对论了。19世纪自命为科学的历史家,以为历史的目的是求历史上绝对的真理,在现代史学家看来,已近于不可能了。无论研究者的态度如何客观,方法如何谨严,但是在选择材料上,解释事实上,历史家不知不觉地受了时代环境、个人主观的影响。历史家所得到的一切只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真理,因之历史家的工作,和其他科学家的一样,永远没有完。

以上所举的影响近代西洋史学最大的三个力量——政治、经济和科学的进步——都是历史学以外的发展,但是对于史学发生了空前的影响。这三种力量到最近才逐渐传入中国,中国在经济生活社会制度学术思想各方面渐由中古式而现代化,现代中国人的思想和所要解决的问题和现代西洋人的差不多,因之即拿现代中国人的眼光来看,中国传统的史学已经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而应加以彻底的改造。但是百年来中国史家究竟做了些什么事?最近改造旧史学的成绩如何?将来应采取什么途径?近来虽然有不少论中国近五十年来或三十年来或当代中国史学的文章和书籍,但从近百年来中国史学发展上来作对比的似乎还没有,遂引起我作此文的动机。我在本文所要说明的是些大的趋势,至于各史家的著作目录,几本通行的书目已经罗列甚详,无须再加撮钞了。

二、清代学者的治史精神

清初学风大抵较晚明王学末流，“束书不观，游谈无根”之弊，竭力实事求是，易主观为客观，改空谈为征实，处处要求证据，不尚空谈。开创这种风气的几位先导大师，若顾炎武、颜习斋、黄梨洲、阎若璩几位先生，除黄氏外，都不是史家，多半是要学以致用，不过这种精神最适于史学的发展。而他们所用的方法，如顾炎武的《日知录》是以考据的方法来表现他的政治经济思想的。黄梨洲治理学，不仿宋明人作语录，而辑《明儒学案》，俱是用的历史方法。黄梨洲更留心明代史实尝辑《明史案》二百四十二卷，又辑《明文海》四百八十二卷，将明代史料，网罗略备。弟子万斯同承其学，参与纂修《明史》之役，对于《明史》贡献极大，结果《明史》比明初人修的《元史》，元人修的《宋史》都好，在正史中，算是一部很好的书。

不过最能代表清代史学特点的还不是官修的《明史》。当清廷正准备着大开史馆，纂修明史的时候，邹平人马驥，网罗三代所有的史料，以及后世较古的记述，辑成《绎史》一百六十卷，起自开辟，迄于秦亡，这是古今对于上古史最伟大的著作。这书的特点尚不在其取材浩博，搜讨详备，而在其编制体裁的特殊。他这部大书，是将古史分成一百多个题目，依次纂述。大体说来，可以说是纪事本末体。不过这书的前边有三十七篇世系表，又有《年表》一卷，后边又有《天官书》等书志专叙制度，仿佛《史记》的八书，《汉书》的十志，其中对于名物制度还有图，又有地图，末附古今人表，表列书中的人物，则又采取了纪传史的特点来补苴纪事本末的不足。至于书中有图，更是前史所无，可见他的特识。后来章学诚所提倡改革纪传史的办法，他多早已实行了。至于这书叙次的方法，尤和以前的史家不同，在正文里面，他不用自己的话，而将以前的史料，直录原文，加以编排，每段史料，皆注明出处。而且他对于史料的斟酌去取，也煞费苦心。他在序里说：

经传子史，文献攸存者，靡不毕载。传疑而文极高古者亦复弗遗。真赝错杂者，取其强半。附记全伪者，仅存要略而已。汉、魏以还，称述古事，兼为采缀，以观异同。若乃全书阙轶，其名仅见，纬讖诸号，尤为繁多，则取笺注之言，类萃之帙，虽非全璧，聊窥一斑。又百家所记，或事同文异，或文同人异，互见叠出，不敢偏废，所疑则传疑，广异闻也。

可见他对于史料的真伪,时代的先后,很下过一番甄别的工夫。虽然现在看来,他所收取的仍未免失之于滥,但是因为他每条都注明出处,不夹杂自己的话,所以读者自己去加以区别并无困难。和宋人苏轼的《古史》,罗泌的《路史》比起来,这部书是何等谨严!何等客观!这种注重客观的矜慎态度,便是清代史学的特点。

马骥这部书出来之后,很受到当时人的重视,对于以后的史学有很大的影响。到了乾嘉时期,清代的学术已到极盛时代。当时正统的学问是经学,而他们治经的方法,是一反宋明人的主观武断的方法,而以小学考据学为工具,来研究古书的意义。有几位大师,治经之余又贾其余勇,拿同样的方法来治史。他们把正史看做经,来研究他们的版本,校正他们的文字,阐明他们的训诂,考证里边的天算历法,地理沿革,职官制度等问题。改变宋明人注重褒贬论断的方法,而注重客观的了解。当时最负盛名的著作是钱大昕的《二十二史考异》。钱氏是当时第一流的经学家小学家,他对于治史也用同样方法。他的序中说:

廿二家之书,文字繁多,义例纷纠。舆地则今昔异名,侨置殊所,职官则沿革迭代,冗要逐时,欲其条理贯串,了如指掌,良非易事……世更有空疏措大,辄以褒贬自任,强作聪明,妄生疣瘤,不叶年代,不揆时势,强人以所难行,责人以所难受,陈义甚高,居心过刻,予以不效也。

这是乾嘉时期第一位史学大师整理旧史的方法。他不满前人笔记书中指摘正史中偶尔的伪误,他更反对宋明人空疏的史论,无谓的褒贬,如《读史管见》、《通鉴纲目》一类的书。他所注意的是文字训诂,全书义例,舆地沿革,职官制度,以及天算历法。钱氏是一位极精细缜密的学者,又深通小学地理算法,经过他一番整理,正史中的疑文晦义,解决了不少。这实在为治史的创了一个方法。

当钱大昕用新方法整理正史的时候,他的内兄王鸣盛也用同样方法整理正史。王鸣盛是当时的经学大师,他的《尚书后案》是当时极负盛名的一部巨著,而他的《十七史商榷》也和《二十二史考异》齐名,清人论史学,往往以钱王并称。他治史的态度和钱氏相同,也是注重了解,而陋视无聊的褒贬和空疏的议论。他自序中也说:

大抵史家所说典制,有得有失,读者不必横生意见,驰骋议论,以

明法戒也。但当考其典制之实，俾数百千年建置沿革，了如指掌，而或宜法，或宜戒，待人之自择焉可矣。其事迹则有美有恶，亦不必强立文法，擅加与夺，以为褒贬也，但当考其事迹之实，俾年经事纬，部居州次，见闻之离合，一一条析，而若者可褒，若者可贬，听之天下之公论焉可矣。书生胸臆，每患迂愚，即使考之已详，而议论褒贬，犹恐未当，况且未确者哉。

可见他对于议论褒贬的厌恶，与钱氏相同。他以为事实弄清楚以后，是非自然明显，无须作者发论，如事实尚未弄清楚而大发议论，那议论也要不得。这种治史的精神，和清人治经的精神，完全相同。王氏是先治经后治史的，他用以治史的方法，也就是治经的方法。他于序中又述说自己治经史的经历道：

予束发好谈史学，将壮，辍史而治经，经既竣，乃重理史业，摩研排纂，二纪余年，始悟读史之法，与读经小异而大同。何以言之？经以明道，而求道者不必空执义理以求之也。但当是正文字，辨音读，释训诂，通传注，则义理自见而道在其中矣……读史者不必议论求法戒，而但当考其典制之实，不必以褒贬为与夺，而但当考其事迹之实，亦犹是也。故曰同也。若夫异者则有矣，治经断不敢驳经，而史则虽子长、孟坚，苟有所失，无妨箴而砭之，此其异也。……要之，二者虽有小异而总归于务求切实之意则一也。（钱氏也曾说：“经史岂有二学哉？”见《二十二史考异》序）

由这一段引文看，更可证明清儒如钱、王者流，治史和治经，是用同一个方法，都是避虚而求实，抱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去整理它。至于他所说的小异，不过仍宥于传统的成见，以为经是圣人制作的，哪敢驳正？至于他们所用以整理二者的方法，是并无不同的。

自钱、王二氏创了这种整理史学的新方法，以后用这方法整理正史的人很多。如张增的《读史举正》（八卷），洪颐煊的《诸史考异》（十八卷）等书都是这类的书。但是以一个人的精力要用考证的方法去整理全部的正史，自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体。像钱、王二氏，皆是早岁通籍，中年即引退不仕，以天赋的聪明，雄厚的根基，用毕生的精力去整理史籍，又兼秉赋过人，克享大年，才有这样的成绩，这岂是普通人所能作到的？但是就钱、王的书而论，每部史书经他们举正的也不过数十条而已，疑文晦义，所余尚

多。于是又有人用这方法专治一史的。最著名的如惠栋的《后汉书补》(二十四卷),梁玉绳的《史记志疑》(三十六卷),钱坫的《史记补注》(一百六十卷未刊),赵一清的《三国志补注》(六十五卷),施国祁的《金史详校》,汪辉祖的《元史本证》都是这类的书。他们范围虽然较小,而成绩则比钱、王的书细密得多了。更有专治某部史书中的某一部的,最著名的有梁玉绳的《古今人表考》(九卷),专考《汉书》中这一卷所列的人物,全祖望的《汉书地理志稽疑》(十六卷)。这种工作,清儒做得很多,经过他们这番整理工作,正史中的几部书才渐渐可以读了。到了清季王先谦才出主意,模仿清人新的经疏体例,将清儒对于两《汉书》所作的工作,网罗在一起,加以整理,修成《汉书补注》一百卷,《后汉书集解》一百二十卷,集清人研究二书的大成,其价值犹如清人的各经新疏。近来日人泷川龟太郎的《史记会注》,体例模仿王氏,也是很有用的一部书。

除了注释以外,清人研究正史第二种方法是补。这种与治经的方法不同了。经是不能补的(但前人也有补经的,如晋束皙补过《诗》,明人好补《周官》,都为后人所讥),史则可以补。司马迁、班固所创的纪传体例,其中有纪,有传,有志,有表,但是以后的正史中,纪传是都有的(《三国志·魏志》原亦有纪,今本无纪,系后人所改),但是表和志,却不是每部都有,譬如《后汉书》即无表(其志亦系刘昭用司马彪《续汉书》补入的),《三国志》表志全无,而且有志的也未必全,如《续汉书》(即刘昭所补《后汉书》者)、《晋书》无艺文志,于研究的人很是不便。于是又有人出来为正史补表补志,有补全史的,如万斯同的《历代史表》(五十九卷),他鉴于自《后汉书》至《五代史》,除了《新唐书》处皆无表,本《史》汉之前例,各为之补撰;有专补一史的,最著名的如钱大昭(大昕弟)的《后汉书补表》(八卷);志的方面如《续汉书缺艺文志》,便有几家替他来补(钱大昭补《续书艺文志》二卷,侯康补《后汉书艺文志》四卷)。这种工作,清人做得更多。最近开明书店将清人和近人这类工作辑印为《二十五史补编》,是一部极有用的书。

补编之外,清人整理正史第三种方法是改编,不过这种工作清人做得并不甚多,成绩也较少。正史中,前四史清人奉之如经,自然谈不到改作。清人最不满意的是宋元二史。《宋史》成于元初人之手,时值异族入主,文物荡然,而是书又卷帙浩繁,成书仓促,所以书中重复矛盾,脱落疏漏,不一而足。清人好纠弹其失,若邵晋涵、章学诚辈皆发愤重修,然皆无成书。至于《元史》,则又以文字隔膜,所涉繁杂,而成书仓促,所以较《宋史》尤

劣，清诸儒如钱大昕、汪辉祖等人皆于是书用功甚深，不过尚只是就本书细斟，至于运用新材料去整理，那是近百年的事，后边再细说。此外周济将《晋书》改编为《晋略》（六十卷），较原书为明析易读，是改编正史较为成功的一部书。

清人整理正史，大约出不了以上所举注释、补作、改编三种方法。但是赵翼的《二十二史札记》则又创出将正史分成若干小题来研究的方法。赵氏是钱、王同时的人，书前边有大昕的序，但他所用的方法却能于钱、王之外，独创一格。赵氏不是小学家，他不长于文字训诂，但是他读书很细心，他用比较的方法，对于史事有许多发明。他自序中说：

是以此编多就正史纪传表志中，参互斟校，其有牴牾处自见。

正史是以人物为主的，所以同一件事，往往散在数处。他用心将他们聚在一起，往往发现其中的牴牾矛盾之处，而可以改正某处的错误。这是“用本书证本书”的方法。此外更利用两部书相同的部分，如《史》、《汉》、《后汉书》与《三国志》，南北朝八书与《南北史》，新旧《唐书》，互相参证，更可发现某一部不实的地方。利用这方法，赵氏对于正史中的问题颇有些重要的发现。

钱、王、赵三氏不但是同时的人，并且是很熟的朋友，在学问上自然互相影响。他们都是当时正统派的学者，但是清代最伟大的史学家，却是一位在当时不甚知名的人。崔述因为生在穷僻的大名，未得与当时的名流学者来往，所以声名不出乡里。但是他对史学的贡献，却远在钱、王之上。他毕生的工作是整理古史，他研究的对象和马骥一样，用的材料也和马氏差不多，但是他的成绩比马氏更伟大些，这是由于他采用了细密的方法和怀疑的态度。由他看来，“大抵战国秦汉之书，皆难征信，而其所记上古之事，尤多荒谬”（《考信录提要》卷上），于是他便把马骥所采取的材料，剔去了大半。至于秦汉以后的讖纬伪书，他更不信了。他所信据的只是经书，经书中未有的，他不敢信，与经书牴牾的，他加以辨正。他用司马迁“考信于六艺”的典故称他的书为《考信录》，他对于经书的看法，也与乾嘉时汉学家不同，汉学家是尊崇汉儒的家法的，崔述却不受他们的束缚。他说：“彼汉人之说经，有确据者几何？但亦自以其意度之耳。”（《考信录提要》卷上）他这见解真高出当时笃信汉儒的经学家之上。他不但不信汉唐人的注疏，他对于经书本身的估价，也和当时一般的经学家不同。他未看

过阎若璩的《古文尚书疏证》，但已经发现了二十五篇伪古文。此外他不信《周礼》、《仪礼》、《尔雅》是周公的书，他不信《礼记》是“圣人之经”，他不信《孝经》是孔子的书，他甚至认为《论语》的后五篇，也靠不住，所以剩下他认为可信的也没有几部了。这是对于古代史料第一次的彻底批判，这是对于传说神话第一次的大扫除。他的《考信录提要》，详述古史传说的造成和旧史料多半不可信的原因，是清代第一部讲史学方法的书，直到现在凡治古史的人都应当细读。

和崔述同时又有一位史学家章学诚，他治学的方法也和当时正统派的学者们不同，他在当时的名望比崔述大。章氏不为当时的训诂章句之学，而专讲史学，他治史学的方法又不从考据入手，而专讲史学的体例。他要改造纪传体，要从“局馆纂修”恢复迁、固的独断别裁，所作《文史通义》一书，议论振奇，锐利无前。但是他因厌薄考据，不免专讲体例，而不讲事实，史学而不重事实，独断别裁，从那里表现呢？他因不愿用考据，所以一部史书也没有作出，他所修的方志，也往往论体例的话多过事实，并且有的时候不免因牵就体例而往上凑材料，殊难令人满意。并且他的议论，初看惊人，实甚肤浅，除方志外，也并没有什么影响。与崔述的潜沉笃实，真是迥乎不同了。

三、道光时期史学界的转变

清代的学术到了乾嘉时期，已走上纯科学的路，实是清代学术的极盛时代。无如好景不常，到了道光以后，学术界又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而逐渐走上功利主义的途径。这种变动自然是当时政治经济混乱的反映。本来有清一代，到了乾隆时期，已经是极盛时代。乾隆好大喜功，连年用兵，享用奢靡，到了末年，已渐感觉到民穷财尽，清代的衰乱遂从此开始。嘉庆一朝，教乱扰攘，元气大伤。到了道光中叶以后，因河工兵饷费用的激增，对外贸易的漏卮，国家遂渐患贫。自道光中叶以后，迄于咸丰中叶，外则有鸦片，英法联军诸役，内则有洪杨革命与捻子之乱，战乱遍天下，用兵二十年，一再失败，国家又渐患弱。如何致富强，遂成了士大夫思想的中心。在此功利思想盛行的时期，乾嘉时期为学问而治学问的精神，自然未免显得迂腐无用，于是治学问的风气就为之丕变了。

道光以后学术的新风气是谈富强，讲经世。在经学方面，由训诂典章名物之学，转而讲微言大义，以求通经致用，遂要讲今文，要沟通汉宋。在

史学方面，由考订校勘转而趋于研求本朝的掌故，讲求边疆地理（特别是西北史地）以谋筹边，研究外国史以谋对外。在这转变的时期，魏源是最杰出的人物，是新时代的代表，对于当时和后来的学术风气影响最大。他有经世的大志，主张通经致用。他说：

曷为道之器？曰礼乐。曷为道之断？曰兵刑。曷为道之资？曰食货。道形诸事谓之治。以其事笔之方策，俾天下后世得以求道而制事谓之经。藏之成均辟雍，掌以师氏保氏大乐正谓之师儒。师儒所教育，由小学进之国学，由侯国贡之王朝谓之士，士之能九年通经者以淑其身，以形为事业，则能以《周易》决疑，以《洪范》占变，以《春秋》断事，以礼乐服制兴教化，以《周官》致太平，以《禹贡》行河，以三百五篇当谏书，以出使专对。谓之以经术为治术。曾有以通经致用为之诟厉者乎？以训诂音声蔽小学，以名物器服蔽三礼，以象数蔽《易》，以鸟兽草木蔽《诗》。毕生治经，无一言益己，无一事可验诸治者乎？乌乎！古此方策，今亦此方策。古此学校，今亦此学校。今亦冥冥焉以为先王之道在是，吾不谓先王之道不在是也，如国家何？（《古微堂集·学篇》）

这是对于乾嘉汉学的重大反抗，这是树立新学风的强烈呼吁。以《春秋》决狱，以《洪范》占变，通经致用，这本是西汉儒家的学问，因之魏源对于经学要抛弃乾嘉专讲训诂名物的经学，而提倡西汉微言大义是经学，这便是今文之学了。清儒专治《公羊春秋》者始于孔广森，他作了一部《公羊通义》。稍后又有庄存与作《春秋正辞》十二卷，说《春秋》专主公羊、董仲舒、何休，他外孙刘逢禄承其学，于《春秋》专为公羊一家之学，以《左传》为刘歆所窜乱，以公羊为孔门微言，著《公羊经传何氏释例》，以发明何氏之学。庄、刘皆常州人，号称常州学派，今文之帜遂渐树立。初期的今文家只讲公羊而已，因为五经之中，只有《春秋》的今文家说保存得最为完整，而公羊家的三世三统改制诸义又切合于当时变法的要求，所以其学最盛。到了魏源，更辑齐、鲁、韩三家《诗》的遗说，著《诗古微》，以发明今文家的遗说，而驳击《毛诗》美刺正变之例；更著《书古微》以抨斥马、郑，以推求西汉经生的古谊；又著《董子春秋发微》上卷以发挥《公羊》的微言大义而补何邵公的不足。其学上承庄、刘的绪余而恢宏扩大之，更著《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以张今文之帜。他的说法虽未免有时粗疏武断，然对于推

进今文家运动,确有很大的影响。

研究边疆地理,也是道光以来学术界的新风气。本来自道光以来,回疆叛变,边祸屡作,当时有识之士,遂提倡边疆史地的研究,以收知己知彼之效。魏源对于边疆史地专治元史。在魏源以前治元史的本来有邵远平的《元史类编》。钱大昕有志重修元史,虽然未能修成,但他所作的《补元史氏族表》、《补元史艺文志》、《宋辽金元四史朔闰考》等书,实对元史有极大的贡献。到了魏源更据诸家的资料,著《元史新编》九十五卷,遂实现重修元史之志。虽自现在看来,他因限于时代,囿于见闻,尚不免挂漏错误,然在当时,固不失为一部杰出的著作。魏源更由边疆史地推而至于域外的史地。在他以前,明史虽然有外国志,但是列国不多,而且语焉不详。至于明末西方来华的传教士,虽然有利马窦的《舆图》、艾儒略的《职方外纪》和清初南怀仁的《坤舆图说》等书,但是中国人大都并不相信。所以《四库全书》提要疑惑此书是教士们根据中国东方朔《神异经》等书,“因依仿而变幻其说,不必皆有实迹”。可见当时的学者们,对于外界的情形,犹不甚了解。到了鸦片战争时期,中国人渐渐知道了西洋人的厉害,并且感觉到要想对付他们必须了解他们。林则徐是一位眼光远大的政治家,当他在广东的时候,便着手令人翻外国报纸和史乘,成了《四洲志》一书。魏源即以此书为蓝本,更依据历代史书及明以来关于外国的史书等书,成了《海国图志》六十卷,后扩充为百卷。其书以地为经,以史为纬,先列地图,中分述各国史地,后附中西纪年对照表,中西异同表,这是中国第一部大规模世分国志,自叙说前人“皆以中土人谭西洋,则此以西洋人谭西洋也”。从这部书出来之后,中国人对于西洋才渐有整个的了解,直到清末,这是关于外国史地主要的参考书,以不懂外国书的人居然能成了这样一部大著作,魄力真是惊人。

魏源是要学以致用,他深愤“士大夫不讨掌故,道听途说,其究至于贻误于国家”(《圣武记》卷一)。所以对于本朝的掌故,尤其留心。他亲眼见到鸦片战争的失败,和金陵条约的缔结,他因愤激郁闷,遂作了《圣武记》十四卷,托始于满清的勃兴,迄于嘉庆朝的教乱的敕平,以推清代国运盛衰,用兵成败的道理,末更讲兵法,和筹饷驭夷的方法,是关于清代掌故的一部奇书。他又编了一部《经世文编》一百二十卷,专甄录清代有关经世政治的重要文字,以供时人的参考。魏源对于当时的财赋、水利、漕运、外交问题都有深刻的研究,对于当时盐法的改革有极大的贡献。他这种